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南北朝文学史

A HISTORY OF LITERATURE ON SOUTH &
NORTH DYNASTY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总纂

一曹道衡

沈玉成

编著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南北朝文学史

A HISTORY OF LITERATURE ON SOUTH &
NORTH DYNASTY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总纂

曹道衡 沈玉成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北朝文学史/曹道衡, 沈玉成编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5004-5979-8

I. 南… II. ①曹…②沈… III. 文学史—中国—南北朝时代 IV. I209.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0834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责任校对 陶 璇

封面设计 孙元明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27 插 页 2

字 数 45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为迎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我们将历届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的部分获奖著作重印出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的首批图书向建院三十周年献礼。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中国文学通史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 邓绍基

副主任委员 刘世德 沈玉成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邓绍基 孙 望 孙 静 刘世德

乔象锺 沈玉成 吴庚舜 季镇准

费振刚 徐公持 曹道衡 褚斌杰

顾 问 余冠英 林 庚 唐圭璋

编写说明

文学史是文学研究整体中的一门重要学科。建国以来，由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集体编写和专家个人编写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各有特色，其中有些著作还发生过较大影响。但目前尚缺少一部论述较为详尽的多卷本文学史著作。为了弥补这种不足，按照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安排，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组织有关单位和有关专家编写十四册的《中国文学通史》，以期作为文学研究工作、高等院校教学工作以及其他文化工作中的参考用书。

按照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的实际情况，为了有利于编写者发挥专长，同时考虑到读者的方便，本书按时代分为十种十四册，计为《先秦文学史》、《秦汉文学史》、《魏晋文学史》、《南北朝文学史》、《唐代文学史》（上、下）、《宋代文学史》（上、下）、《元代文学史》、《明代文学史》（上、下）、《清代文学史》（上、下）、《近代文学史》。各册自成起讫而互作适当照应，合则为文学通史，分则为断代文学史。

本书编写的总要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阐述我国古近代文学的基本面貌，要求材料比较丰富翔实，叙述比较准确充分，力图科学地、全面地评价作家、作品，从而阐明各种文学现象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继承和发展关系。限于主客观的种种条件，实际的工作必然和上述要求有所距离，书中的不当以至错误必然不可避免，敬希海内外的学者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下面是对编写工作中一些具体问题的说明。

一、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负责总纂，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协作编纂。

二、本书各册的编写方式不取一致，采用主编或编著者负责制，即各册的学术观点、学术质量统一于主编或编著者。

三、本书设立编纂委员会，负责协调各册的编写工作及组织质量审定的

工作。编纂委员会设正、副主任委员，负责处理有关工作。

四、编纂委员会聘请各协作单位的著名专家三人担任全书的顾问。

五、各册的编写服从于统一的全书编写方针，但各册的内容、体例均相对独立。各册之间的分工、衔接以及内容中必要的互见都经过讨论、协商。

六、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由于各种原因，本书中仅对少量用汉语写成的少数民族古典文学作家、作品作了论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目前正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出版后将可和本书互参互补。待将来条件成熟而本书又有机会作较大的修订，自当酌增这方面的内容。

七、本书的编写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文学研究所负责同志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的支持和赞助，也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鼓励；在出版工作中又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大力支持，谨此一并致以谢忱。

《中国文学通史》编纂委员会

目 录

编写说明	(1)
第一章 南朝文学概说	(1)
第一节 南朝的社会和文化	(1)
第二节 南朝文学的繁荣	(5)
第三节 南朝文学的特色	(10)
第四节 各体文学的发展	(14)
第二章 晋宋之间诗文风气的嬗变	(22)
第一节 玄言和山水	(22)
第二节 题材的多样化	(26)
第三节 艺术形式的发展	(28)
第三章 谢灵运和谢惠连	(32)
第一节 谢灵运的生平	(32)
第二节 谢灵运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性格	(33)
第三节 谢灵运的山水诗和其他作品	(38)
第四节 谢惠连	(46)
第四章 颜延之和谢庄	(51)
第一节 颜延之的生平和思想	(51)
第二节 颜延之的诗文	(53)
第三节 谢庄	(58)

第五章 鲍照	(64)
第一节 鲍照的生平	(64)
第二节 鲍照的乐府诗和其他诗歌	(65)
第三节 鲍照的赋和文	(71)
第四节 鲍照的影响和鲍集的版本	(74)
第五节 鲍令晖	(75)
第六节 汤惠休	(76)
第六章 江淹	(82)
第一节 江淹的生平	(82)
第二节 江淹的诗歌	(83)
第三节 江淹的拟古诗	(86)
第四节 江淹的赋和文	(89)
第七章 永明诗风的新变	(98)
第一节 从元嘉到永明	(98)
第二节 “永明体”的特色	(99)
第三节 诗歌声律的探讨	(102)
第四节 新体诗	(106)
第八章 谢朓和王融	(110)
第一节 谢朓的生平和思想	(110)
第二节 谢朓的诗歌	(113)
第三节 谢朓的辞赋和骈文	(121)
第四节 谢朓的影响	(122)
第五节 王融	(124)
第九章 沈约及范云、任昉	(130)
第一节 沈约的生平	(130)
第二节 沈约的文学主张和作品	(132)
第三节 范云	(138)
第四节 任昉	(140)

第十章 王俭、张融、孔稚珪和齐代其他作家	(145)
第一节 王俭和齐初文人	(145)
第二节 虞炎、虞羲及其他诗人	(147)
第三节 张融	(150)
第四节 孔稚珪和刘绘	(152)
第十一章 何逊、吴均、柳恽和梁代前期作家	(158)
第一节 何逊	(158)
第二节 吴均	(161)
第三节 柳恽及其他作家	(166)
第十二章 《文选》	(175)
第一节 总集的出现和《文选》的编订	(175)
第二节 《文选》的选录和分类	(176)
第三节 《文选》的影响和后人 对《文选》的研究	(181)
第十三章 从“永明体”到“宫体”	(186)
第一节 宫体诗的出现	(186)
第二节 宫体诗出现的原因和对它的评价	(189)
第三节 萧衍父子	(192)
第四节 庾肩吾和刘孝绰兄弟	(201)
第十四章 徐陵、阴铿和梁陈之间文学	(206)
第一节 徐陵的生平和作品	(206)
第二节 《玉台新咏》	(211)
第三节 阴铿	(214)
第四节 沈炯、周弘正和陈初作家	(217)
第十五章 江总和陈代其他作家	(221)
第一节 陈代诗风的变化	(221)
第二节 张正见、刘删、祖孙登	(223)

第三节	江总、姚察	(225)
第四节	陈后主及其侍从文人	(228)
第十六章	南朝乐府歌辞	(232)
第一节	南朝乐府新声的兴起和发达	(232)
第二节	“吴声”和“西曲”	(235)
第三节	南朝乐府歌辞的文学特色	(237)
第十七章	《文心雕龙》和《诗品》	(247)
第一节	刘勰和《文心雕龙》	(247)
第二节	《文心雕龙》的创作论	(249)
第三节	《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和文学批评史观	(254)
第四节	钟嵘和《诗品》	(258)
第十八章	北朝文学概说	(265)
第一节	北朝的社会和文化	(265)
第二节	北朝文学的发展和分期	(268)
第三节	北朝文学的特色	(272)
第十九章	“十六国”文学	(277)
第一节	“十六国”文学概况	(277)
第二节	王嘉和《拾遗记》	(280)
第三节	苏蕙、苻朗和僧肇	(282)
第四节	张骏和李暹	(285)
第五节	汉族民歌	(286)
第二十章	北魏和北齐文学	(289)
第一节	北魏初期文学	(289)
第二节	北魏中后期文学和温子昇	(292)
第三节	邢劭、魏收和北齐作家	(298)
第二十一章	《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颜氏家训》	(305)

第一节 《水经注》	(305)
第二节 《洛阳伽蓝记》	(311)
第三节 颜之推和《颜氏家训》	(315)
第二十二章 庾信	(322)
第一节 庾信的生平和思想	(322)
第二节 庾信前期的作品	(325)
第三节 庾信后期的作品	(328)
第四节 庾信的成就和影响	(337)
第二十三章 王褒和西魏北周文学	(342)
第一节 西魏的文化和文学	(342)
第二节 王褒	(344)
第三节 北周其他作家	(348)
第二十四章 北朝乐府和歌谣	(351)
第一节 北歌的创作和流传	(352)
第二节 北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	(355)
第三节 《木兰诗》和《敕勒歌》	(359)
第二十五章 《世说新语》和南北朝志怪小说	(366)
第一节 小说在南北朝的发展	(366)
第二节 《世说新语》	(367)
第三节 志怪小说	(374)
第二十六章 隋代文学	(380)
第一节 隋代文学鸟瞰	(380)
第二节 卢思道	(383)
第三节 薛道衡	(387)
第四节 孙万寿和由北齐入隋的文人	(390)
第五节 隋代的南方文人	(392)
第六节 杨素和隋炀帝杨广	(395)

第七节 民歌和农民起义的诗文	(400)
第二十七章 南北文风的融合	(405)
第一节 南北文风的区别	(405)
第二节 南北文风的融合过程	(410)
后记	(417)

第一章 南朝文学概说

第一节 南朝的社会和文化

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一般是从宋武帝刘裕代晋（420）起算，至隋文帝开皇九年（陈后主祯明三年，即公元589年）为止，共一百七十年。自从东晋南迁，汉族的政权偏于江南一隅；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已经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但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陆续消灭北燕、北凉，统一北方，才正式形成南北朝的对峙，时当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中期（436—439），上距刘宋开国仅十余年。所以，把刘裕代晋作为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的开始，是符合实际的。

东晋南渡加速了江南的开发，特别是带海、傍湖和沿江的地区发展更快。《宋书·孔季恭传论》：

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江南的水乡泽国，开发较晚。《禹贡》九州，荆、扬二州排在最后，“厥田惟下中”、“下下”。自东晋至陈亡二百七十余年间，才逐步把江南建设成“良畴美柘，畦畝相望”（《陈书·宣帝纪》），荆、扬两州成为南朝的经济中心，也是全中国最富庶的区域。《宋书·何尚之传》说“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两州刺史，多半以皇弟或皇子充任，一些主要的城市也大多集中在这两州。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虽然仍是经济中的主要成分，但以城市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却有了长足的发展。北来的豪门和

南方的土著地主不遗余力地经营自己的庄园。陈郡谢氏在始宁的庄园地包南北二山（谢灵运《山居赋》），会稽孔氏在永兴的庄园周围三十三里（《宋书·孔灵符传》），都是著名的例子。江南优越的自然条件，从此而得到充分的利用。从整个情况来看，社会经济只要不遭战乱的破坏，始终处在上升发展的过程中。《南史·循吏传序》概括宋、齐、梁三代的“盛况”时说，宋文帝时代“家给人足”，“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齐武帝时代“十许年中，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梁武帝前期务从节俭，废齐末苛政，“四海之内始得息肩”。以唐朝人而修南朝史，不会有过分的虚美隐恶，今天来看，只能认为这些记载可能失之片面夸饰，却并非无中生有。经济的繁荣或者萧条，时局的安定或者动乱，并不能决定文学创作的质量，却可以影响文学创作的面貌。南朝时代的元嘉、永明、天监三朝正是南朝文学创作的旺盛时期，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現象。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南朝时代对文化和文学具有直接影响的社会矛盾是世族与寒门之间的矛盾。

世家士族对社会的统治在东晋以后已经逐渐削弱，但仍然在顽强地保持既得利益，不肯放松经济、政治上的垄断。然而作为政权最主要的支柱即军队，南朝时代却一直为非高门出身的将帅所掌握。长期习于逸乐的高门世族不论在观念上或实际上都不愿意再像谢安、谢玄那样去组建北府兵^①，而寒门庶族的子弟要获得晋身之阶，军功几乎成为惟一的途径。掌握了军事大权，再跨前一步就成为皇帝。南朝四代的开国之君都出身于“布衣素族”，又同样通过军事力量而迫使前朝逊位。于是，皇室和世族之间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局面始终是左右南朝政局的一种最重要的因素。

高门世族鄙视武人，而一旦武人登上帝位，他们又不得不出来表示拥护捧场，宋、齐、梁、陈四代的“禅让”大典，领衔主事、奉玺进绶的都是高门，特别是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这种态度，一则是维持既得利益需要武力的保护，二则是保家重于殉国，他们对改朝换代的态度，往往决定于本家族甚或家庭的利益，反映在道德伦理上的忠孝之辨，正是这种情况的折射^②。他们企图继续垄断政治，而长期以来的特权和社会风气已使他们不需要依仗实际的才能而自能坐致高位，入仕之后又以不问政事为清华高贵，“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干宝《晋纪·总论》），以至于出现了王敬弘做尚书仆射而不解“讯牒”的现象（《南史·王裕之传》）。

南朝诸帝对付高门的办法是颇具针对性的。他们需要高门世族这一重要社会基础，给予充分的礼遇和经济上的实利，但尽可能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力。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秘书丞一类“清贵”之官，还保持着由高门独占的局面。既名“清贵”，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实权的被剥夺。高门所控制的惟一有实权的高位是吏部尚书。但从宋文帝以来，真正接近皇帝、典掌机要的中书通事舍人却几乎都由出自寒素而有实际行政能力的人来担任。在高门世族还控制着舆论标准的南朝，这些人多被目为“小人”、“细人”，所以《宋书》、《南齐书》分别把他们归入《恩倖传》、《倖臣传》^③。

南朝四代的统治时间都比较短，宋五十九年、齐二十三年、梁五十五年、陈三十三年。各朝历代，帝王都以争夺政权和巩固政权为最主要的目的。皇室和门阀之间的利益，既有一致，又有差异。争取门阀的拥护而又削弱他们的力量，始终是关心政务的君主所注意的焦点。从总的趋势来说，东晋时代皇室完全依赖门阀支撑的局面在南朝已经逐步改变，皇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加强。晋宋之际发生过谢氏家族和刘裕父子之间矛盾的激化，结果是以刘氏皇室取得全面胜利而告终。宋文帝时代，谢晦举兵反抗，把他杀掉固然名正言顺；谢灵运桀骜不驯，欲加之罪还必须诬以“谋逆”；宋孝武帝杀王僧达，同样也要把他和高阁的武装叛乱硬扯在一起。但到宋明帝杀王彧，则干脆不用再找任何借口。这些事实也许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皇室和门阀势力之间的消长。到梁武帝统治的四十八年间，高门在政治上的力量已不如从前，偏于自保；梁武帝也吸取前代的经验，“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于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梁书·萧子恪传》），杀戮知名士人的事已不再出现。原因之一在于这些高门子弟中，已经缺少真正有能力的从政人才，构不成对皇室的威胁，实际政务已经归于中下层士人，所以《颜氏家训·涉务》才会从另一角度说“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世家子弟在政治上但求和皇室合作，平流进取加上经济上的稳定，于是自然而然地有更多的精力投入文学创作。

皇室和门阀之间的矛盾趋向缓和，但皇室内部的矛盾在宋、齐两代却极为尖锐。宋初有刘裕诸子之争，宋文帝为其子刘劭所弑，宋孝武帝、前废帝、宋明帝三朝，皇族内部的骨肉相残达到了骇人的程度^④；而在齐代，齐明帝几乎杀尽了“高、武子孙”。这种剧烈的政治动荡不能不影响到文人的命运、思想，并在创作中有所反映。谢灵运、鲍照、范晔、颜竣、王融、谢朓的死于非命，都和皇室内部的争斗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梁武帝处理上层

集团之间的各种关系采取比较缓和的政策，四十多年的安定给文学带来了某种畸形的繁荣，但发生在他末年的侯景之乱造成的全社会性的破坏，又把这种繁荣摧残以尽。

魏晋时代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代，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为经学的衰微、玄学的兴起，并导致了哲学、文艺领域里普遍的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和探讨。佛学的西来为思辨哲学增添了一支异军，而且到东晋时代由玄学的附庸而蔚为大国，最终与玄学交融而形成中国化的佛学。

到南朝，思辨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唯我独尊的局面又有所变化。有关玄言佛理的清谈还在继续，但其盛况毕竟是和东晋时代不能并比了。在高门华胄中，它还作为一种传统的形式被保留了一段时期，比如《南史·徐羨之传》记徐羨之与谢晦、傅亮聚会，“亮、晦才学辩博，羨之风度详整”，《王惠传》记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史臣没有详记谈论的内容，但从所使用的语言接近于《世说新语》来推测，内容当亦不离“三玄”一类的题旨。比较详尽的记载见于王僧虔的《诫子书》，告诫儿子要懂得清谈之不易：“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粲）命汝言《易》，谢中书（庄）挑汝言《庄》，张吴兴（邵）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邪^⑥？”书作于刘宋时代，可见当时清谈仍以“三玄”为主要内容。刘宋以后，尽管还有一些专治“三玄”的学者，但专门探讨玄理的清谈则更少见，士人聚会，讲论的内容逐渐转到儒家和佛家的经典上。

儒学在南朝的重新被提倡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玄学崇尚自然，有反抗名教伦理的积极一面，但也有避世、颓废的消极一面，末流所及，则是为极端的放浪和纵欲提供了理论依据。玄学思想用之于经世治国，就要求尽可能不去人为地激化社会矛盾而听其自然缓解，王导的“务在清静”（《晋书》本传）和谢安的“去其烦细”（《世说新语·政事》注引《续晋阳秋》），都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体现。这种治国方略可以苟安自保于一时，却难有积极的作为。东晋后期的内忧外患造成的严重危机，迫使当国者对“清言误国”的现象进行反思。本来，所谓经学即儒学的衰微不过是相对于东汉时期的极盛而言的，它并没有真正消歇。即使在玄学风靡全部上层社会的两晋，仍然得有太学、国子学的建制，还有经学博士。而经过魏晋两代的比较鉴别，证明儒学仍然是更适合的统治思想。所以南朝时代又形成了儒学重新振兴的趋